

试论中国五四世界语运动

曾永恒¹, 徐雁¹, 刘敏²

(1. 西昌学院 社科系, 四川 西昌 615013;

2. 塘桥高中 史地组, 江苏 张家港 215611)

【摘要】 中国世界语运动从发轫到“五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五四时期尤为显著, 但未遂五四先驱们所愿的成功。究其发展的原因: 一是合乎当时社会需要; 二是世界语本身的优点; 三是其顺乎人类共同理想。而其受挫的原因: 一是汉字存在的合理性, 改行世界语不现实; 二是其传播时间不长, 人们对之了解不深; 三是世界语运动者目标不一致。

【关键词】 中国; 世界语运动; “五四”

【中图分类号】 K2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06)03-0094-05

中国世界语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曾是五四先驱们的关注焦点之一, 《新青年》杂志曾于1916年到1919年为此开展过一场历时三四年之久的大讨论。世界语在五四期间的确获得较大的发展, 然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成为中国一门辅助语言或者取代汉语成为中国的拉丁化官方语言(和中国白话文一样的地位)。就此, 本文将探讨一下五四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原因及其受挫原因。

一 五四世界语运动发展的原因

世界语是由波兰的柴门霍夫博士创造出来的。柴门霍夫怀着创造一种国际上可以共同使用的普通话的崇高理想。他于1887年公布他所创造的言语方案时所用的署名是DOKTORO ESPERANTO, 意即“希望者博士”, 后来人就把这种言语称为ESPERANTO, 我们译为世界语。它对于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和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 是一种积极的有益的因素, 也是一种积极的有力的因素。同样对推动我国的语言文字进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悉世界语大约在清朝末年就传入了中国。世界语引进中国后, 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由于《新青年》杂志的提

倡, 世界语运动在各地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世界语可以说是“舶来品”, 为什么其传入后, 就能生根、发芽, 并且在五四期间获得如此亲睐和礼遇, 得到迅速地发展? 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 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和“西方文化最优”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 国人迷醉于“天朝上国”的固有文化的信心逐渐被打破, 而“西化”之风愈演愈烈, “以旧学为不适应, 而竞相唾弃者, 项背相望”, “将无论学说, 器物, 皆以外至者为尚。张目四盼, 俨若国中无一物, 可以当其爱恋者”^[1]表现于文学界, 则是:

“文人学士, 咸从事于左行文字, 心醉于白伦之诗, 莎士比亚之歌, 福禄特儿之词曲, 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2](p31)]文学西化的首端, 就是文学工具——语言文字的西化。最早对汉字提出批评和主张“废汉字改拼音文字”是传教士和谭嗣同。但他们的主张大多是偶感而发, 缺乏系统性。近代“废汉字”思潮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代表者, 还要数辛亥革命时期的新世纪派。恰逢其时, 世界语初创并在世界上得到迅速发展。废汉字主义者于是相中了世界语。1908年春, 《新世纪》连续刊出署名为“前行”、“笃信子”、“苏格兰君”, 主张直截了当地废弃中国文字, 并提出万国新语(世界语)的替代方案。以钱玄同、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

收稿日期: 2006-05-12

作者简介: 曾永恒(1974-), 男, 湖南衡阳人, 讲师, 西华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从事专门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五四新文化健将们，传承了新世纪派的衣钵，把废汉字的路走的更远，并将倡世界语发扬光大。1917年6月，钱玄同致书陈独秀犹称“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3](p21)}。一年后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就从“存汉文并用世界语”一跃为“废汉文而用世界语”。钱氏发表此论后不久，傅斯年就在《新潮》杂志上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一文，予以响应。此外还得到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人一定程度表示支持汉字改革和世界语运动。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世界语运动与废汉字思潮纠缠在一起，是因为世界语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语言文字改革的呼声，正切当时内忧外患所逼而改变“死文字”的需要。且世界语成为代替汉字的首选方案之一。

其二，从世界语本身优点来看。世界语的创造是建立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基础之上，吸收了欧洲各主要语言的语法和词汇，去掉了其中不合理的成分而发挥了其合理的部分。它具有科学性、逻辑性，简单易学，优美动听，富有表现力。刘师培是近代中国最早宣传世界语的人物之一。他在《天义》最终卷中的《Esperanto 事例通译总序》和《Esperanto 事例通译》两文中具体地表现出他对世界语的关注。他认为世界语是最为简单的文字，推广后可使“无论如何人人都是可以容易地旅游于世界各地”^[4]。《新世纪》也是较早关注和倡导世界语的刊物。如1908年《新世纪》一篇署名为“前行”的文章就说：“中国现有之文字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亦有识者所具有同情者矣。”^[5]另一署名“醒”的作者在《新世纪》上连载文章《万国新语之进步》中，通过对世界语和各国语比较后提出了世界语文法的简单性，他不满意于前民的文字改革主张，果敢地论述：“苟吾辈而欲使中国日进于文明，教育普及全国，则非废其目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可”^[6]。作者认为英文虽然较良于中文但不是最好的文字，如采用英文可能发生种种矛盾，因而采用万国新语是最好的方法。近代废汉字改为万国新语声音最洪亮的倡导者之一吴稚晖，他认为“径用万国新语”最有利于世界的“划一声音”，“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万国新语淘汰欧洲文字之未尽善者而去之，则未尤较良。弃吾中国之

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尤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7]。由此可见早期的“废汉字”风潮中的有识之士，“慧眼识真珠”相中了具有诸多优点的世界语。这一点也为后来五四世界语倡导者诸君所赞同。如钱玄同就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指出在废汉字后，“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 esperanto。”^{[8](p128)}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也曾积极倡导世界语，并率先将世界语引进教育界。他说：“吾人学外语，难于西人，而既学欧西一国语以后，再学第二国语，便与西人无异。今使第一次所习者为最易习之世界语，则有助于再学西语不鲜。”^{[9](p122)}总之，五四一代的世界语倡导者们对世界语的优点是有充分认识的。

最后，从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看。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日益频繁，不得不学习多种语言文字，这势必要耗费人类无可估量的时间、精力、劳力和物质等等。因此，客观上就需要一种国际共同语言，即人类普通话。如果用一种流行教光的民族言语，则势必造成国际交往中厚此薄彼的不平等和对语言的歧视。因此，世界语以其善良的愿望和崇高的理想，作为国际语理想的具体体现者，便自然而然地可以作为国际上的共同语言。这正如柴门霍夫所说的世界语不是哪个人、哪个民族私有的。因此，从世界政治和民族感情上说，世界语，也只有世界语最适宜成为人类共同使用的言语工具。更何况还有世界语的结构和本质上富有固有的优点和生命力。来看看五四先驱们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陈独秀说：“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10](p107)}鲁迅先生在《渡河与引路》当中说：“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语言；所以赞成世界语。”^[11]蔡元培也说：“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所处地位，觉不能不与世界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中国人用世界语，可以促进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世界语是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力工具”^{[10](p121, p124)}

二 五四世界语运动受挫的原因

新文学运动取得显著成绩，白话文、新诗、新

戏剧、新式标点等主张赢得社会广泛的认同，而唯独“汉字革命”“万国新语运动”相对上述来说显得有些“门前冷落鞍马稀”。正如胡适所说：“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问题之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注意，也没有多大得进展，——那就是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部分指世界语运动）的问题”。^{[12](p258)}不管胡适说的在多大程度上正确，但是的确世界语运动的“大”发展相对新文化其他的运动的大发展又是“小”的。原因不外乎下列三点：

第一，汉字存在的合理性。汉字具有语言文字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和它也遵循语言文字变化的规律。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选择某一种语言，某一种文字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而一经选定，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般地说，人类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等标点符号体系，从本质上看无所谓优劣高低之分。再者，还应该看到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的发展变化，不单单是实用不实用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一个文化民族尊严和民族情结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具有悠久语言文字传统的国家中国来说，更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诚如有的论者所说：“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于世界，在国际进行各种交往，它的存在符号就是语言。语言符号的遗失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以致民族地位的遗失，所以语言的演变只能在继承传统的条件下进行”。^[13]由于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是否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有利于追求民族平等。所以汉字的存废，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予以研究讨论和循序渐进地推进。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不断加重，从“爱国存学”出发，保持汉字的相对稳定性，无疑是有其合理性。梁启超在反对新世纪派废弃汉文汉语就万国新语，写下了长文《国文语原解》，强调汉文汉语是中国国粹，不能轻言废弃。他意味深长地说：“若我国文，则受诸吾祖，国家之所以统一，国民特性之所以发挥，胥是赖也，夫安可以废也？”^{[14](p31)}章太炎当时也撰写了《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章，毫不客气地称同属于“反满革命”阵营内的新世纪派一班人，是一批夸夸其谈的“妄庸子”和“西方牛马走”。章太炎强调，只要国家不灭，民族界限犹存，民族语言文字就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如果强使一个民族改用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必将导致其民族性的丧失，所谓“语言文字亡，而性情

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15]再来看看五四先驱的态度，陈独秀认为钱玄同提出废汉字改用世界语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治方法，本志同志多半是不大赞成的。^{[16](p318)}可见陈独秀只是赞成学习世界语，并不支持废汉字改用世界语。鲁迅也认为“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世界语，却无从断定。”对世界语的前途持观望态度。在此期间陶孟和的观点讲得尤为见地。他在致钱玄同信中认为，“夫一种之语言，乃一种民族所藉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语言，而其言语之形式内容，各不相同，语法有异，而所涵括之思想观念亦复不齐。盖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从这个决度上他强调，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其生命力必不长久。^{[17](p101)}朱我农则在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方面认识较为深刻，他说：“无论哪一种语言文字，只有因为文字不合语言，把文字改了的（先生所说，意大利废拉丁文，就是最好的证据）；断没有用文字去改语言的。如此推想，就知道私造了一种文字（这文字二字是假定的称谓），所以 Esperanto 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简直是无用的东西。”^{[18](p234-235)}朱我农断定“无用”，可能太绝对了一些，但他的确道出了语言文字变迁的规律。作为此次世界语运动的主要提倡者的钱玄同，在受到冷遇和批判之后，逐渐放弃了改行世界语的主张。

第二，世界语传播的时间不长，人们对世界语的认识粗浅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世界语是一项新生事物，而且刚刚传入经济和文化相当落后的中国，许多人对它并不了解，加上一部分保守者和怀疑者的反对，它要在我国传播，无疑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的。世界语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它有什么用处，它的前途如何，它对我国有什么帮助，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围绕在人们心头的迷雾。《新青年》为此曾展开一场大讨论这就说明了五四先驱们对世界语都不太了解。《新青年》杂志的讨论首先就是有一位名叫 T. M. Cheng 的读者对世界语心存疑虑而提出来的。他给编辑部记者的信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的通信栏（1916年）。信的内容是请教世界语究竟可不可以学，学后是否有用。陈独秀

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含糊、态度暧昧地答复这个问题。对世界语理解似乎有些不明不白,对其前途更是信心不足。想支持之、又举棋不定。陈独秀的见识和心态大致可以表明当时先驱们大多是如此的。胡适基本上是反对改行世界语的,但在讨论中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不吭声、视而不见的态度。就连热心支持的鲁迅后来都承认:“我是不知道世界语的——我只认识 *estas* 一个字。”^{[10] (p110)}可见五四健将们只是出于支持新文化的道义上支持世界语,而非出于深刻理解方面的理性支持。

第三,世界语的目标不甚明确、一致,而导致各自为战、未形成合力。新世纪派和部分五四先驱们认识到汉字的流弊而认为语言文字误国,由于救国心切,于是积极主张改行世界语,正如杨思信在论述五四先驱们提出废汉文行世界语时说:“它既与辛亥革命时期新世纪派的激烈主张一脉相承,同时又受到近代‘语言文字误国论’的深刻影响,加之黑暗现实的刺激与新文化运动的催生,其出现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19] (p301-302)}从这方面来说迄止五四期间提倡世界语始终没有得到理性的思索而形成系统的完整的可行的目标,只是随时而发。胡适则慎重说:“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

怕挑起许多无谓的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20] (p288-299)}胡适认为仓促行事,欲速而不达,明确主张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再下结论定目标。除了前者学术界的情况,有的宣传者把目标定在学习世界语可以“阅五十余国之书报”,“直接阅读彼邦之科学书,得新知识”,或者可以“游历外邦”,与各国同志通消息。有的则向往民族平等和睦得“大同世界”。他们由于受柴门霍夫人类一员主义和世界语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现实采取中立主义态度,存在着为世界语而世界语的倾向。但是,也是一部分世界语者,把世界语同中国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例如,他们主张用世界语改革中国文字,结合政治运动,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又如,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上海世界语学会将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向各国世界语界进行了报道。还有一部分世界语者开始从事世界语文学的翻译工作。一方面把外国的被压迫者文学,通过世界语译成中文;另一方面把我国进步文学,如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王昭君》等作品译成世界语,介绍到国外去。如此林林总总,可以窥见当时各界对世界语运动是没有具体一致的目标的。更有甚者,由支持世界语运动走向反对之,如1918年后,周作人就声称:“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要充分的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21] (p101)}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论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J]. 东方杂志. 第1卷第4期.
- [2] 冯平. 梦罗浮馆词集序[J]. 《南社丛刊》第21集.
- [3] 钱玄同. 论世界语与文学[A]. 钱玄同文集[C]. 第一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 申叔. 人类均力说[J]. 天义. 第3卷, 1907年7月10日.
- [5] 前行. 中国新语凡例[J]. 《新世纪》第20号.
- [6] 醒. 续万国新语之进步[J]. 新世纪. 第36号, 1908年2月19日.
- [7] 燃(吴稚晖). 新语问题之杂答[J]. 新世纪. 第44号, 1908年4月25日.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五四运动文选[C].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59年版.
- [9] 侯志平编著. 世界语运动在中国[M].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1985年第一版.
- [10] 陈独秀. 新青年. 第2卷第3号(1916年). 侯志平编著. 世界语运动在中国[M].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1985年第一版.
- [11] 唐俟(鲁迅). 渡河与引路[J]. 新青年. 第5卷第5期, 1918年.
- [12] 胡适.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导言[A].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C].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 [13] 郑敏. 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J]. 文学评论. 1994年第2期.
- [14] 梁启超. 国文原解[A].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20. 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
- [15] 章太炎. 规新世纪[J]. 民报. 第24号.

- [16] 陈独秀.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A].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C]. 上海: 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 [17] 陶孟和. 陶履恭的信[A]. 钱玄同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18] 朱我农. 朱我农的两信[A]. 钱玄同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19] 杨思信著. 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 [20] 胡适. 致钱玄同[A]. 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 [21]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年.

On the May Fourth Esperanto Movement of China

ZENG Yong-heng¹, XU Yan¹, LIU Min²

(1.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2. Tangqiao Middle School, Jiangsu 215611)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to May Fourth Movement, especially in May Fourth Movement era, the Esperanto movement in China developed rapidly, but didn't attain the goal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ioneers.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its success: the requirement of that society, the merits of Esperanto, and the good for the common ideal of human being. Also,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The first is the reasonable exist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Esperanto to substitute Chinese character; the second is not long time of Esperanto in China and Chinese don't know it well; the third is no coincidence of the aim of Esperanto people.

Key words: China; The Esperanto Movement; May Fourth Movement

(责任编辑: 周锦鹤)